

核心阅读

邓小平是在法国期间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道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懂得了实事求是，就大有希望；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会胜利。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独到的认识和思考。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有关论述很有意义。

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年谱》记载：1922年2月，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逐步接受革命思想。邓小平回忆说：“我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那时共产主义团体在西欧已经成立了。”《我的父亲邓小平》记载：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不久，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这个刊物主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刊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译文，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邓小平不仅负责刻蜡版和油印，而且他以“希贤”和化名发表一些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道理。邓小平回忆说：“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

邓小平眼中的马克思

□ 倪德刚

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加入中国共旅欧支部后，我从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邓小平一生坚信马克思主义。1926年初，邓小平来到莫斯科后说：“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致中央政治局的辞职信中说：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坚信马克思主义一生的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颠扑不破的。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很朴实的，懂得实事求是就大有希望

邓小平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道理，很朴实的道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

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前说：“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为什么要抓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这

个。讲空话不行，要有具体措施，统一认识。实事求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1978年5月，邓小平专门论述了什么是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实事求是毛主席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实事求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道理，也是他讲得最多的道理，列宁也讲得很多。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养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实事求是呢？邓小平简要地说：“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他坚决反对：“有一种风气，不采取老实态度，就是吹。这不行。要讲老实。吹只能骗自己。”他讽刺地说：“这些年把一些人养成懒汉，写文章是前边摘语录，后边写口号，中间说点事。”邓小平大力倡导实事求是才能大有希望的道理何在呢？他说：“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

实事求是，大有希望的关键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众所周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郑重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会胜利

邓小平1943年11月10日《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

邓小平这段话不长，但包含着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

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始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始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现在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遵义会议开始是符合历史和实际。

实际上，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论断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1943年，邓小平就指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就把党的事业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我们的事业一直胜利发展着。邓小平的这种认识，无疑是准确、深刻的。毛泽东本人也多次强调我们党真正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比如，1941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后，又恢复了按照辩证法行事，即按实际办事。”又如，1941年12月毛泽东在为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进一步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进入新境界。然而，如何进一步提升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功能，仍然是治国理政和全球治理当中较为突出的重大课题。

北京师范大学张志丹教授《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版）一书从“意识形态功能”的视角，深入系统地阐述了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功能提升的缘起论、概念论、境遇论、经验论、理念论、应对论、路径论，从而彰显了以功能视角深化扩展意识形态建设论题的新视野，并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推进到新境界。作为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研究的新成果，该研究的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该研究主要有三个突出特点：

其一，以现实实践作为提升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根据。该书首先从为何当前我们要聚焦于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功能的问题谈起，关注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境遇问题。该研究立足于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动向、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动态、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主流意识形态功能遭遇弱化的境遇而进行的探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聚焦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功能提升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该书的突出特色和亮点是，从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视角，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深入剖析了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矛盾和问题。

其二，以聚焦问题作为提升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关键。该书聚焦“意识形态功能”的问题域，着力分析意识形态功能的战略提升问题，研究以“理念”转换、“战略”定位、“路径”厘清来支撑意识形态功能提升论题。该书不仅对中西方国家提升意识形态功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提炼总结以及借鉴吸收，而且还提出并深入阐述了我国意识形态功能提升的新理念，并对其经典范例——中国梦的意识形态创新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发，认为需要在主流意识形态创新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核的基础上，承接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基因并吸收国外优秀文化合理元素，积极关切社会心理、反映社会诉求和人民心声，以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型话语和表达方式创造性重构。问题意识在书中一以贯之，逻辑层次清晰明了，围绕研究论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

其三，以综合创新作为提升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归宿。该书主要围绕“两个如何”展开：如何通过历史、现实反思与理论分析，破解意识形态功能的新定位与唯物史观相统一的难题；如何以文本研究与现实反思相结合来深度研究当代我国意识形态功能提升的理念、路径和机制。细读文本不难看出，书中围绕战略提升新时代主流意识形

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灵魂。没有相结合并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思想，就无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此，就没有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

其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七大前后，顺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纷纷从不同角度论述毛泽东思想。王稼祥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刘少奇在七大上第一次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并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1943年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从有关资料看，作为当时军队干部（在八路军总部、师一级军队干部中）和地方干部（在中央各个分局中），邓小平是第一个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

其三，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就会胜利发展、感觉很幸福。邓小平是一个很少说奉承话、假话、违心话的人。邓小平说，我们党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后，一直胜利发展着。“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

邓小平始终坚定、坚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必然出路，中国也只有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才不断取得伟大胜利。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虽然没有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在他的脑海里、在他的精神和思维世界里，在他的曲折革命实践道路上，却谙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道，纯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法。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创造出了邓小平理论。



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新探索

评《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

□ 刘同舫



态功能及以上“两个如何”为重难点进行了跨学科整合的创新式思考，坚持创新与批判、理论与实践统一。综合来看，该书提出“意识形态功能提升”这一命题，主要突出了强调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需要直面问题、借鉴中外经验教训，需要更新意识形态的样态等，以创新与批判相结合为主要内容，以抓重点、聚焦点和制度体制建设为路径，提升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功能，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读史书 悟书法

□ 松 涛

对传统文人而言，人的内心情感常常会通过书法、绘画表达出来，比之诗歌和音乐更具有真实性，这是中国书法之于世界的一大独特特征，与中国传统美学息息相关。孔子说“志于道”“游于艺”，庄子讲“解衣盘礴”，“道”是万物规律，“艺”是形式手段。中国书法兴起于先秦，又以汉末为界，前期主要是书体的演变，后期则侧重书风的变迁。许慎《说文解字》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书者，如也。书写的目的是“如”，即用文字客观反映出我们心里对于物象的把握，用主观、抽象的线条点画来描述客观、具象的事物，在组织这些线条点画时，其中又包含了书写者内心的情感，因此每个人书写出的疏密、偏正、较侧都有所不同，所谓“因情生文，见文生情”。当把人的情感反映到文字上时，书写便升华到了一种艺术的境界，美学思想自然也就蕴涵于其中了。

中国书法的发展流变，与时代特征亦紧密相连。汉代以降，形成所谓“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之说。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分裂”成为了当时时代的主流。表现在书法上，也体现出了明显的“旧体”与“新体”并存的情况。这一时期的文人名士对人生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在生活态度和处世作风上较之前代都有了极大的变化，他们放浪形骸，服食丹药，把书法作为竞相夸耀的技能。这其中尤其以“二王”为代表的新书风的确立为典型。相比起“旧体”，二王“新体”突破了传统的以字为造型单位的旧法，创造出以两个或三个单字的形态集约成为一个造型单位，形成了大于单字结构的“字群结构”，这是有别于前代的崭新的美学理念。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中说：“夫欲书者，多干研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书。若平直相似，状若算子，上下方平，前后齐平，不是书，但得其中点画耳！”以《丧乱帖》为例，行轴心线的剧烈摆动是王羲之新书风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一大创举。书法上表现出的这种跌脱不羁的结构，与魏晋时期放浪形骸的名士风度是完全吻合的。

唐代是我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高峰时代。彼时政局稳定，国力强盛，思想开放，与外国交往密切，人们的生活也极大稳定、富足，文艺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样的时代精神反映在书法上，就形成了鲜明的带有盛唐气象崇尚法度的书风。书



法发展到了唐代，法度完备，尤其盛中唐时期，可称为书法发展的鼎盛时期。

宋代国势倾颓，政治上重文抑武，积贫积弱，政局摇摇欲坠，文人的审美开始左右艺术创作的倾向，书家创作的作品重心由楷书开始向小行书转移。这一方面是由于书法自身发展的脉络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时代精神的影响，书家转而开始对书法意趣的追求，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宋代“尚意”书家群体，与当时同时发端的文人画，在美学上有着相同的追求。

元代以降，书法审美的文人化趋向愈发明显。及至明清，由于帝王美学爱好的左右，台阁体、馆阁体盛行，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的变革已如落日余晖，直至清末碑学盛行，书坛颓势才为之一振。

除了与时代精神的影响，与之相关的哲学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法的发展。儒家思想影响了艺术的主体，道家思想影响了艺术的本体。当“清淡”与“风流”成为名士之间的一种时尚时，哪怕是在书法法度完备的时代背景下，也很难想象当时的书家能像盛唐书家那样写出法度严谨的作品来。王羲之之子王徽之雪夜访戴逵的典故就是例证，这一时期的名士常常做出超凡脱俗的举止来。所以继王羲之之后，把“今体”发展到更加纵逸的人其实是其子王献之。羊欣评小王的书法说他“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王献之胜过其父的“媚趣”正是东晋后期书风比中期更加妍妍之所在。

近年来，“国学”成为社会上备受关注

的一个热点话题。就艺术家而言，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个人的艺术修养与国学修养的关系。以当代书法创作为例，熊秉明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抛开这个命题的真伪不谈，“书法热”确实是当代“国学热”中相当热门的一个话题。所谓“欲为书家，首先应为大文人、大诗人，即一个具有高度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辨，且能身体力行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知晓书法的本原意义，而不仅仅是一个写字匠”。当代书法之所以长久以来饱受诟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当代的书法家身上，很难再找到传统文人书家的那种人文修养。

古代书家的成功，恰恰是因为他们并不以书为业，书法只是闲暇时一项自觉的活动（当然这里并不包括清代卖字鬻画的一批人）。客观地讲，书法艺术发展到了当代，各种法度齐备，已经很难在形式上有新的突破了。而当代艺术家要做的，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完善自身的修养，这其中既包括了艺术修养，也包括了国学文化修养。纵观古今书法家，无一不是饱学之士。王羲之作《兰亭序》，欧阳询撰《艺文类聚》，虞世南编《北堂书钞》，颜真卿摹《韵海镜源》，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今人鲁迅、于右任、启功等皆文坛巨匠。